

“余秋雨老宅”其实就是笔生意

今日视点

余秋雨在浙江慈溪市桥头镇的老宅成为当地一个著名景点,据桥头镇文化站透露,经过他们艰苦的修缮,目前老宅内的陈设已完全恢复了余秋雨小时候的样子,而文化站正努力争取在最近让这幢老宅成为慈溪市文物保护单位。此举引来一些专家和网友质疑,称余秋雨老宅“不够格”。

(9月3日《青年报》)言必称“文化”的余先生虽然争议不断,但在文坛江湖里是很有名气的。不过,余大师究竟给我们这个时代奉献了什么样的文化,以及这个文化具有怎样的历史地位,目前谁也无法给

出明确评判。桥头镇不遗余力地要让余宅成为文保单位,究竟是要保护什么样的文化?

当然,这些不是当地有关部门重点关注的所在。读完报道可知,虽然余宅不具备申报文保单位的条件,但在当地政府的关照下,余宅成为慈溪市文保单位俨然是板上钉钉的事。他们如此热心,剥开文化的外衣,里子恐怕还是余秋雨这个文化符号所具有的市场开发价值。

种种迹象表明,虽然余宅打的是“文化保护”旗号,但实际上运作准确说则属旅游开发范畴。当然,为了显得有品位,他们将余宅称为“文化景点”,他们的作为也

就顺势推舟成为“文化旅游业”了。而为了产出的最大化,自然要尽其所能地利用种种手段为旅游产品添加金字招牌,以凝聚人气,招徕游人——余宅申报文保单位无疑属其中的一种。

这样看来,余宅申报文保单位似乎不够厚道,不过和不少地方凭借虚无缥缈的神话、传说就大建景点,然后卖票收钱比起来,它还不算太拙劣与功利,毕竟还有余先生这么一个大活人经常在电视里纵论“文化苦旅”。既然是要卖票收钱,那么,如果大家不买账,就算余宅申报国家级文保单位,乃至世遗,又有什么用?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。

(修仰峰)

第三只眼

经营城市搞得走火入魔了吧

这些年,一些城市热衷于借名人的光环来扩大城市知名度,而为了更好地发展旅游、扩大招商引资,于是出现了为“董永故里”、“李自成埋葬地”、甚至是无厘头的“孙悟空诞生地”而争得你死我活的新闻。如果说过去的争夺都仅限于已经故去的名人或虚无的神话人物,那么,余秋雨老宅申报文物保护单位,则将这一不正常的现象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:城市已经等不得活着的名人去世了,也等不得他们的历史贡献被学术界盖棺定论了——这是何其浮躁?

正如新闻中提到的,“目前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名人故居,名人大多已不在世,而且名人的历史地位早已奠定。”而余秋雨目前不过是一个被广为争议的文化名人,他的历史贡献有多少,至少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学术观点——或许他的贡献问题还根本没达到学术探讨的层次,对于这样的文化名人,他的老宅有多少文物价值?更让我担忧的是,这样的申报会不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,比如各地都搞名人故居工程,你申报余秋雨老宅,我申报易中天故居,你申报文化名人,我申报体育明星,没有名人的城市,挖空心思,或许还能考证出当地为某名人配偶出生地。一言以蔽之,如果我们的城市遍布的是“余秋雨”、“易中天”、“于丹”等人的文物保护单位,恐怕不是文化事业的繁荣,而是一种把关不严的泛滥。(徐德国)

恐怕还得文化评价说了算

第二落点

一幢老宅是否有资格成为文保单位无非看两点:其一,宅子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价值,从建筑到陈设都具有文化意义上的独特性和稀缺性;其二,宅子的主人或声名卓著的历史文化名人,其人其事总有着深刻的历史影响和民间认同。

显而易见,余秋雨老宅本身在文化意义上根本无足轻重,如果说有价值那也是余秋雨先生一个人的价值。因此,余秋雨老宅能否成为文保单位的关键,只能仰仗余秋雨本人是否称得

上历史文化名人。而这,又有赖于社会大众对他稳定的评价和认同。

尽人皆知,余秋雨先生是文化名人。只是,言必称文化的余先生,不仅他的历史散文硬伤颇多、屡遭诟病,近几年被“祛魅”的趋势也是异常明显,隐现“一个人的背影”。短短几年时间,余先生就已暮气沉沉,所谓“历史文化名人”可否担当得起?文物专家们坦言,现在还很难判断余秋雨的历史贡献。这是审慎之言,也是一种诚实立场。置身这样一个几乎是批量制造名人的时代,名人的意味其实已今非昔

比,红极一时然后湮没无闻的例子不知凡几,独领风骚别说数百年,就是数十年者亦是寥若晨星。如果把流星般名人的故居都申请成文物保护单位,那文物的价值未免也太过廉价?这绝不是我们对文化应有的保护而不批,以为不重要,或者虽然重要但没有钱?

如果多年之后,事实证明余秋雨先生当真是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,那他的老宅自然是无可争议的文物保护单位。现在去申请,未免行之过早了。

(张强)

谁与“铜镜被盗”有必然联系

【媒体思想之刘洪波专栏】

敦煌博物馆被盗四面铜镜,其中包括一件国家一级文物。《西部商报》9月3日的消息说,案发时博物馆正免费开放,馆内人员复杂。

湖北省博物馆免费开放之初,博物馆方面就有很大的安全担忧:人员拥挤、事故隐患、文物损坏和文物扒窃等。现在,敦煌博物馆文物白天被盗,我并不以为这就是免费开放导致“馆内人员复杂”使然。

没有免费开放,博物馆门可罗雀,文物未必不会大白天被盗;实行免费开放,馆内人员复杂,众目睽睽,未必就更容易让文物大白天被盗。门可罗雀的博物馆,与“馆内人员复杂”的博物馆,哪个更好,我看还是“馆内人员复杂”为好,而且是比只有几个看守人员要好得多。文物失窃,账就要往免费开放头上算,实在是很不靠谱。

新华社的报道说,敦煌市博物馆馆长傅立诚介绍,敦煌市博物馆安全防护设施较差,只有一套红外线报警设施,而这一安防设施是在夜间闭馆后才启用的,白天游客参观时全靠安防人员值守。

这个情况,真是出人意料。白天全靠安防人员值守,不是失窃的理由。对待文物,第一是安全保存,第二才是研究利用,这应是常识。敦煌博物馆来的毕竟不是抢匪,而是偷儿,既然如此,靠人员值守也应当不被偷走。追究责任的话,当班值守人员恐怕难辞其咎。

但是,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博物馆为什么会安防设施缺乏。敦煌,一座名闻世界的旅游城市,文化遗产简直可称城市命脉。这座城市文物丰富,游客众多,换个说法,让人眼红的宝贝多和“人员复杂”可以说是基本的市情。它的博物馆却“安全防护设施较

差”,不知是基于何种考虑,或者是遇到什么困难。博物馆没有提出安防设施方案,还是方案未获批准?如果是前者,博物馆是干什么吃的;如果是后者,那么又是基于何种原因而不批?以为不重要,或者虽然重要但没有钱?

文物失窃,安全值守人员要承担责任,是理当如此。敦煌市博物馆缺乏基本安防设施,对这样一个局面,估计就很难有什么人会承担责任了,道理还硬硬:缺乏安防设施与文物失窃之间没有必然联系。

社会上存在着很多“没有必然联系”的事情。缺乏安防设施,与博物馆文物失窃之间没有必然联系;公款宴几回客,与经费不足没有必然联系;建豪华办公大楼,与贫困人口的存在没有必然联系;贿赂风行,与社会道德沦丧没有必然联系。谁能说前面一件事情发生了,后面的事情就必然要发生呢——我做得很地

道,但你还是要好好地做自己的事啊。

没有必然联系,就不必承担责任。这是肯定的。谁与那些要承担责任的事情有必然联系呢,无非是博物馆的看守之类“直接责任人”而已。矿塌了,有必然联系是矿主,而不可能是管理矿业的人;闹事了,有必然联系的是几个头头,而不是被攻击的哪个机关。总之,有必然联系的,是一些直接站在事情里面的人。

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越是重大的问题发生之时,我们几乎找不到谁与如此局面有必然联系。例如一个女中学生自己投水,与群体性事件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呢,有必然联系的就是那些闹事的人而已,如果有的话,再加上幕后黑手。至于社会一般的管理状况如何,似乎并不重要,而且也怪不到哪个具体的人头上。

(作者系著名杂文家,《长江日报》评论员)

公务员退出机制的“所有者缺位”

【中国观察之杨涛专栏】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发的《关于印发〈国家公务员局2008年下半年工作要点〉的通知》中明确,昔日被视为“铁饭碗”的公务员将建立正常退出机制和辞退规定。

(8月30日《北京晨报》)

消息一出,连日来评论者一片叫好。但我却只能表示谨慎的乐观,因为长期的工作实践让我深知,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存在的老大难问题,绝非一纸文件就能迅速解决。

经济学中有个名词叫“所有者缺位”,是指国企中国有资本由谁负责不确定,导致国企效率低下,冗员偏多,损害国有资产的行为经常发生。其实在政府管理中,“所有者缺位”的现象同样存在,在不少政府机关,领导人通常是上面指派下来的,而且往往是“异地交流干部”,当地人大仅仅是形式上的选举,当地民众不能对领导人产生实质意义上的监督。因此,政府部门领导人是“对上不对下”。在这种情形下,政府机关的“所有者”是上级而非当地民众,政府机关的领导人与工作人员也认定他们的“老板”是上级而非当地民众。

这种政府机关的产权性质决定了政府机关的“所有者缺位”,上级政府是所有者的,但只能通过选派代理人,甚至通过代理人选派代理人来管理政府机关。上级政府由于信息不对称,又缺乏有效手段来约束其代理人,这些下派的官员往往就不会像一个所有者一样很好地管理政府机关,而是尽量采取妥协的手段来谋取自己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。当国家利益可能影响自身利益时,他们往往宁愿损害国家利益来保全自己。

理论太抽象,可以举例说明。在许多单位,就有一批吊儿郎当的人在混日子,大事不犯,小事不断,在上班时干自己的事远远超过干工作的时间。按照公务员管理的有关法规,这些人早就应该清退,但实际上他们年年考核合格。原因就在于,这些人认为,他们只是领了国家的工资,并没有领单位领导人的钱,领导人不是像企业主一样是发工资给他们的“老板”,而只是国家的代理人,而他们深知国家作为“所有者”是天高皇帝远,也管不着他们。领导人要是严格遵守法规来对待他们,那就是代理人充当了所有者的角色,这让他们会迁怒于领导人,闹个没完。而领导人作为“异地交流干部”,除非这些人损害了他们自身的核心利益,否则也犯不着与他们计较,他们宁愿向上报告人手短缺,也不愿意去得罪这些人。所以我们看到,作为公务员正常退出手段的“开除”,仅仅用于严重违法犯罪入狱的情形,2006年全国被开除的公务员仅有950人。行政机关三番五次精简,但最终的结果是越减越多。

要解决公务员正常退出难的问题,就必须解决政府机关的“所有者缺位”问题,也就是说,要完善官员既对上负责又要对当地民众负责的机制。当地民众、当地人大是政府机关的直接所有者,他们的监督如果能到位,政府机关的领导人就不能像糊弄“天高皇帝远”的上级机关一样糊弄当地民众、当地人大;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被清退,也就无法迁怒于领导人,因为所有者在他们身边,领导人必须严格遵守制度,否则他们自身饭碗难保。如此一来,何愁公务员不能正常退出。

(作者系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客座教授)

治教育乱收费需要新模式

公民发言

《重庆晨报》9月3日报道,开学两天来,重庆市物价局价格举报电话接到了166个与教育收费有关的咨询电话和投诉电话。有关信息显示:自立收费项目、多收钱少开票等乱收费行为依然存在。

重庆并不寂寞,比如《合肥晚报》9月2日就报道了安徽“50多位家长反映各种乱收费还真有点‘乱’”的情况。9月3日,人民网更是推出了《9月开学,各地网友给地方领导留言反映学校乱收费》的综合报道。

这就叫人纳闷了,教育乱收费多年来雄踞价格投诉榜首,怎么却一直没法根治?管理部门好像只会发文件、做检查、等举报,这种治理,有用才怪!不知道管理部门有没有想过——既然学

校会自设“桌凳费、饮水费”,那么,能否从根本上杜绝学校接触学生从而收钱的机会?比如学生先把钱交给第三方,经公示后再转给学校。另外,既然学校会暗示、逼迫学生“自愿”选择一些项目交费,那么,能否从根本上防止学校对学生的授意?包括举报方面,也是可以变一变的——举报假烟、假盐、假光碟生产线,都可以获得不菲的奖金,举报教育乱收费如果来个10万元重奖,许多家长就不会那么忍气吞声了,拿了这笔钱,即使不敢让小孩读你这所学校,也有了去其他学校择校的本钱。

多年来根治不了教育乱收费,不知道管理部门是否心有愧疚?还请多用脑子想想办法,别再死守发文件、做检查、等举报这些老掉牙的招数了。

(李辉)

“万科自救”正成为楼市坚硬现实

热点纵论

王石,这个在中国楼市牛气冲天时就敢喊“中国房价泡沫早晚都会破裂”的人,正在把预言变成行动。万科上海8个楼盘集中促销,但与此同时,万科上海楼盘今年以来的连续降价已引发前期购房者“退房”的呼声。(9月2日《上海证券报》)有趣的是,坚持咬住“中国房价还有上涨趋势”的潘石屹尽管宣称“SOHO中国将在9月1日之后平均涨价5%”,然而,记者暗访却发现,北京三里屯SOHO不但未涨价,反而还有优惠,是不折不扣的“嘴上喊涨暗中打折”。

在中国楼市寒冬不可避免地来临的背景下,万科的自救就不再是个意外信号,而是市场自发调节规律的启动。当初支撑房价高涨的,无非就是那千年不变的“供需论”,以及由此衍生的

人口结构论、人口增长论,城市化发展论等。其价值核心就是土地资源有限,而国人的需求是无限的,以无限需求支撑有限土地价值的暴涨,理论前景非常美好。

然而,“供需论”的最大破绽在于,它忽略了民众现实购买力有限这一基本事实。当房地产把土地从实在的自然资源变为“虚拟资产”,像股票一样在庄家与散户间倒腾时,大盘“永远走高”的托力也是有限的。因此,今年的房市萧条、购房者怨怒“退房潮”,以及诸多房产商支撑不住低下高傲的头,其实是对前两年房价严重脱离国民经济基础的报复性下跌。

王石是聪明人,他知道,现在放弃不是死撑的时候了,是该放房地产继续暴利的幻想了。王石想明白了,其他的房地产商呢,还要抱着虚幻的暴利死不撒手吗? (毕舸)

社保全国统筹为何要再等30年?

热点纵论

社保异地转续有望年内破冰,而实现全国统筹则需要30年-50年。这是《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研究》课题组牵头人、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透露的信息。

(9月3日《广州日报》)社保异地转续终于要破冰,自然让人欣喜。但为何全国统筹要这么长时间?杨宜勇认为是国内各地收入水平差距太大引起的,如果这条理由成立的话,则30年-50

年也未必能够实现全国统筹。更有可能的是,30年之后,差距会更大。在我看来,社保实现全国统筹难,并非是因为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过大,而是各省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。

每年春节前,深圳有两个地方都有彻夜排队的人群,一个是火车站,另一个是社保局——农民工在这里办理退保手续。自从深圳市社保基金个人服务中心2003年开始办公以来,每年春节前,这里都会聚集如同潮水一般前来退保的农民工。与其相对应

的一个事实是:广东省总工会一项针对外来工的调查结果显示,65.3%的外来工换过工作,其中换过两次以上的占50%。社保账户不能转,农民工自然选择退保。而退保的最大获利者就是政府。

按照规定,农民工退保只能退出个人账户中的钱,而企业缴纳的部分则归当地社保基金所有。换言之,企业为外来员工支付的社保资金便源源不断进入深圳市政府的口袋,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人口红利。今年全国“两会”期间,全国政协委员何小平在

谈到农民工养老保险时提道:去年深圳共有400余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,而退保人数竟然高达83万人,这样一来,深圳一年能够坐收8个亿的养老保险金。社保全国统筹的利益难题的巨大,由此可见一斑。

社保异地转续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,但想要让老百姓真正受益,实现全国统筹势在必行。但如果不让社保基金从地方政府的利益格局中解放出来,实现社保全国统筹,恐怕就不只是几十年的时间。(林卫萍)